

梁启超修身三书

节本明儒学案(上)

梁启超 编著
彭树欣 整理

非外借

二十世纪初,梁启超(任公)编著了三种旨在介绍传统儒学之道的书,此三书既为梁任公用以自修的修身指南,也是他用以推行公同学说的指南书。今予以整理出版,名之曰“梁启超修身三书”。(节本)明儒学案,是节录《明儒学案》中的修身言论而成,但此书绝非原书的简单本,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,现在一般视为学术史著作,而在梁启超看来,此书的主要作用还是“宗徒者以入道之门”,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修身指南书,可以说,它已经是与《明儒学案》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。此书约有二十万字,与原书的卷帙相较,则大大增进了可读性。

原书有百万字,即《明儒学案》,十之九以为常道,而或或疑其非要道也,吾再读之,代有若尔,乃今刊印成数本,追加眉目,书钞以便观览,非但点窜(删改),宗改(删底),且以今日学道之弊,亦有取此道之学以药之,吾不欲新学风而救国家,读清古书,惟此书最便,而原书浩繁,故者或疑其非,本意公也,又欲逐逐一谈,超乎群校,仍元心也,抑今者社会现象日益复杂之前,学道之书无量,想固不能占位十之一耳,征诸古书应读者又无算,吾道之书,又古世十之一耳,以天有限之日力,而治多数不可读之书,其孰能?故分此本于世,亦为同志助其精力云尔。(《节本明儒学案·节本例言》)

梁启超修身三书

节本明儒学案（上）

梁启超 编著
彭树欣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修身三书. 节本明儒学案 / 梁启超编著; 彭树欣整理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325-8573-1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②彭… III. ①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B825②B248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96898 号

梁启超修身三书·节本明儒学案

(全三册)

梁启超 编著

彭树欣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0 插页 15 字数 336,000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8573-1

B·1024 定价: 8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编者前言

梁启超(任公)身跨政、学两界,名满天下,著述宏富,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。然而,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,其形象却飘忽不定,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,其学多面无统绪。其实,任公一生跌宕起伏,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,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;其学问涉猎极广,多所开创,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:其一贯、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。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。

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,深化于戊戌变

法之际,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。政治行动的挫败,促使他从政、学两方面深入反思: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,则内心无主宰,行动无根柢;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,则知识愈多,愈为作恶的工具。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:曾国藩走的是“道德改造”路线,从改造自己做起,然后砥砺朋友,找到一个是一个,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;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“功利改造”路线,以功利为本位,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,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;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,变本加厉,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,天下事遂不可收拾。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,“现在一般人,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,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,根本去划除”(《梁先生北海谈话记》);表现在教育上则是“智育日进,而德育日敝”(《节本明儒学案》眉批)。概括言之,政治、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,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

学的衰落。

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，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统驭科学，以德育统摄智育；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，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；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，推己及人，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。此是任公的“晚年定论”，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，也是他编撰和出版《德育鉴》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三书的原由。

不幸的是，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，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：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，学校则适成为“贩卖知识杂货店”（《为学与做人》）。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？修身三书的出版，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、徐志摩、梁漱溟的人生道路，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

上改变了历史？

任公有诗云：“世界无穷愿无尽，海天寥廓立多时。”今天重印是书，名之曰《梁启超修身三书》，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，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。

三书之所由作，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，一面总结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，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会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。惟愿有缘读是书者，如任公所期望，真实做修养工夫，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！

刘海滨

2016年4月7日

导 读

一、梁启超与修身之学

梁启超(1873—1929),字卓如,号任公,又号饮冰室主人,广东新会人。他不仅是近现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,而且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。其人早慧,12岁中秀才,17岁中举人。24岁主办《时务报》,名噪一时,以至上自通都大邑,下至穷乡僻壤,几乎“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”。1898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,史称“康梁”。变法失败后,他流亡日本,先后创办、主编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《新小说》等报刊,

虽身居海外，仍执国内言论界之牛耳。民国初期，梁氏先是活跃于政界，出任司法总长、财政总长，并与蔡锷一起策划起兵反对袁世凯。后退出政坛，耕耘于教育界、学术界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，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力和影响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。

在梁启超这些成就的背后，有他的人格力量在作支撑，而其人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一门根本性的学问——修身之学。尽管这门生命的学问在近现代因不被重视而逐渐湮没，但梁氏却浸润其中，生命得以涵养，人格得以陶铸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着力挖掘、整理这种学问，将其发扬光大，惠及后人。其中编纂成书的就是我们称之为“梁启超修身三书”的《德育鉴》（1905年）、《节本明儒学案》（1905年）、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（1916年）。这三种书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总结和融会：《德育鉴》按修身的步骤和方法

分类摘录先秦、两宋、明清儒家的修身言论，并加按语以阐发其精蕴，提示用功的要领，这可视作一部儒家修身概要之作；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是将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中的修身言论节选出来，单独成书，这是一部断代的修身言论集；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是将《曾文正全集》中的修身言论选录出来，编辑成书，这是一部儒家个人的修身言论集。这三种书，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读本，曾风行一时。

其实，中国古代修身之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；传统中国人以此安身立命，成就了士君子乃至圣贤之人格境界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。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因此梁启超说：“天下最大之学问，殆无以过此！”（《曾文正公嘉言钞序》）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整理、出版这三种晚清民国时的修身书的原因。

二、“修身三书”编纂的思想背景

《德育鉴》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的编纂出版,既与梁启超的教育、修身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,又与 20 世纪初其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。

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偏居一隅,历史上曾属文化落后地区,但在明代出了一位心学大家陈白沙。白沙心学,开明代学术之端绪;其学以修身为主,偏重内圣,注重人格涵养。一代大家在这一民风彪悍之地向导士风,化民成俗,功显当时,且泽及后世。故直至清后期,新会人仍延续着陈白沙的思想脉络,乾嘉考据时风熏染不到。梁启超的祖父、父母乃至自己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,禀承白沙心学传统,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,砥砺人格。他以宋明义理、名节教

导后辈，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，而尤喜举亡宋、亡明国难时先贤志士之事津津乐道。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，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：“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，淑身与济物而已。淑身之道，在严其格以自绳；济物之道，在随所遇以为施。”（梁启超：《哀启》）母亲赵夫人，知书达理，相夫教子，谨守家风，以贤淑名闻乡里。祖父、父母的善言懿行、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，渐渐滋养着梁启超的德性生命，并培植了其修身之学的根基。

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学有一个认识、感悟、体证的过程。他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接触到了《曾文正公家训》，稍大一点，读全祖望写的黄宗羲、顾炎武两篇墓志铭，内心受到激励。古代儒家哲人的修身智慧如电光石火，开始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闪耀。而梁启超真正关注修身之学是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时期。康氏的修身之学主要禀自其师朱九江；朱氏

之教，德性和学问并重，授学者以“四行五学”。其中，“四行”即是德性之学，包括敦行孝悌、崇尚名节、变化气质、检摄威仪。此外，康有为隐居南海县西樵山达四年之久，独力为学，以陆王心学和佛学自修自证。康氏的教学重德育，居其教学内容十之七，尤喜以孔学、佛学和陆王心学施教。受此影响，梁启超开始着力读修身之书，如《明儒学案》就是常读的。尽管梁启超也常研究西学、史学等知识性学问，但从未丢弃过这门生命的学问——修身之学，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时，修身之学即成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1898年，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流亡日本，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在此期间，梁启超通过对前期经历的自省和反思，行动和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

首先是自我修养工夫更加落实和深入。1900年因读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“猛然自省”。这在梁启超的人生修养中，

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,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,觉得“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”。此年,梁启超设日记自修,以曾文正之法,凡身过、口过、意过皆记之,而每日记意过者,乃至十分之上。此后通过自己的探索、实践,并借鉴古代儒者的修身经验,梁启超最终形成了自己常用的修身法门:一曰克己,二曰诚意,三曰主敬,四曰习劳,五曰有恒。

另一方面,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反思,他认为,要有新国家,必须先“新民”,于是在1902年创办了《新民丛报》,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《新民说》,阐述其新的理论探索。所谓“新民”,意在培养新式现代国民,塑造平民人格。按照梁氏的设想,新民必须兼具中西道德文化素养。所谓“新”有二义:一是“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”,一是“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”。前者是指发扬光大中国旧有的道德、文化,后者是指吸收、融入西方新的道德、文化。但在实际的思想建构中,《新民说》的

前期文章主要是用西方的道德、法律观念来塑造国民,并希望全体国民以此自新。然而,到了《新民说》写作的后期,梁启超认识到了“新民”本身的艰难。这一认识的产生,当然有他平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方面的因素,而其“新大陆之游”,则是一个重要的触媒。

1903年正月,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,开始游历美洲。美洲新大陆之游为梁氏打开了一个新鲜而广阔的西方世界。他既目睹了它的文明和繁荣,也洞察到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。这使他对原先理想中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。其中在旧金山华人区的考察,对他触动尤为强烈。如旧金山华人区报馆之多,令他吃惊;各会馆的运作也仿照西人党会之例,似乎非常文明和缜密。然而他发现,华人只学到了西方文明的形式,其本质依旧未改变,华人区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。旧金山之行,使梁氏亲身体会到了国民改造

之不易,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“新民”问题。因此旅行结束后,他写了《论私德》一文。这是《新民说》后期的一篇重要文章,作者意欲修补其前期过于西化的主张。该文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“新民”思想乃至整个德育思想的转变。

梁启超将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,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学问主要属于私德领域。在《新民说》前期,他将公德与私德并列,且着重于引入公德。而在《论私德》中他认识到二者应该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,“新民”应以私德为本,如果没有私德的培养,“欲以新道德易国民,是所谓磨砖为镜,炊沙求饭也”。公德乃私德在公领域的推广,“公德者,私德之推也,知私德而不知公德,所缺者只在一推”,“是故欲铸造国民,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”。因此,梁启超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,即儒家修身之学。此时他实际上回到了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思路,即以修身为本,然后推己及人乃至家

国天下。其国民改造或德育思路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：由重国民的改造转为重士人的培养。因他看到改造普通民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，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精英，认为应先塑造精英，再影响民众。写于1903年的《论私德》，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由“新民说”回归儒家修身之学的前奏。之后，他于1905年又编纂了《德育鉴》和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。而1916年编纂的《曾文正公嘉言钞》则是这一思路的延续。

其实《新民说》中对西方道德、文化的提倡，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向西方寻找国民改造资源的一次尝试，只是他思想的一个侧面，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根基主要还在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中。然而吊诡的是，梁启超的引进西学的“新民说”在“五四”启蒙思潮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中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，而他德育思想